
20 世纪前半期云南 革命出版活动的发展及其影响

张军云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昆明 650034）

【摘要】从 20 世纪初开始，云南革命出版活动以报刊为先导，“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宣扬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前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成立后，云南革命出版活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在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造云南和平解放舆论导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出版活动；革命运动；云南；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6) 09 — 0108 — 07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大量的西方理念和知识传入，对国人产生深远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慈禧太后两次发布“变法上谕”，清政府逐渐开放言禁，允许臣民上书言事，^{[1] (P92)} 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观念由此开始渐入人心。20 世纪初，激进的云南知识分子以报刊为先导，开启了云岭大地革命出版活动的滥觞。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成立后，云南革命出版活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在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造云南和平解放舆论导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0 世纪前半期（1900 — 1949 年）的云南革命出版活动，既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是云南各族人民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云南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以报刊为先导，“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宣扬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革命

19 世纪中期以来，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断加剧对华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以及英、法等列强在云南的不停渗透和蛮横侵略，激起云南各族人民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抗争。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海外及国内纷纷创办报纸杂志（兼编印书籍），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1] (P25)} 为宗旨，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对云南的侵略暴行，声讨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宣传爱国民主思想，鼓吹反帝反封建革命。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云南籍日本留学生在东京组织云南同乡会编译社，“以开通内地、输导文明为宗旨。……输入新知识、新思想，开通顽固陋习，警醒我桑梓诸青年”。^{[1] (P22)} 随后，创办《云南》杂志等期刊，对云南传播近代新思想、新文化，在海外吹响了云南革命出版的号角。1905 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云南籍留日学生有几十人加入了同盟会，其中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罗佩金、叶荃、唐继尧、刀安仁、黄毓成、张开儒等人，是同盟会筹建和初创时期的骨干；次年，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吕志伊为支部长。1906 年初，孙中山、黄兴接见云南籍留日学生李根源等人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

作者简介：张军云（1978 —），男，云南保山人，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编审，主要从事出版学及云南地方文化研究。

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贪官污吏，如丁振铎、兴禄的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即越南），皆以云南为侵略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及外侮侵凌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2]并指定宋教仁、陶成章等人“为之帮助”。在同盟会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云南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第一本期刊——《云南》杂志同年4月正式创刊，李根源、赵仲为总干事，负责全面工作；张耀曾为总编辑。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刊名，并为之题词“振我民气”，以示鼓励《云南》杂志创刊号的正式出版。《云南》杂志一出版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要宣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本旨”；以“启人智识，惊醒国魂，激起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唤国人之睡梦，提国运之进步，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大声疾呼，警醒睡魔。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为自己的重要任务，^[2]号召三迤大地各族人民起来斗争。《云南》杂志从创刊到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5年之久，共出版发行23期及纪念特刊《滇粹》一册。由于《云南》杂志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云南社会状况、帝国主义与云南等方面，并适应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初创时发行量为3000份，一年后扩大到1万余份。除在昆明兴隆街设有分社外，在北京、上海、贵阳等省外39个城市及昆明、大理、腾越等省内9个府、州、厅、县都设有分社，派有代表及调查员，并设立发行所；在新加坡、越南、缅甸瓦城也开设了代办所。《云南》杂志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3] (P14)}为同时期发行量仅次于《民报》的一种革命刊物。

受《云南》杂志的影响，滇省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出版活动。1908年，滇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相继创刊出版了“滇人言滇事，宣传近代民族国家思想，感动社会改良”的《滇话报》，以及以论述滇事为主，“有关治滇方略，国防建设，边疆开发、实业振兴”等内容的《筹滇》。《云南》杂志还直接催生了《云南公报》《云南旬报》《云南日报》《星期报》等进步刊物。此外，在《云南》杂志的影响下，留学越南的云南学生在河内创办了《云南警告》、留日滇籍学生回国后在北京编印了《滇事危言》、昆明爱国青年编印了《滇铎》、留越学生在昆明办了《云南旬报》，等等。^{[1] (P25-26)}出版发行革命报刊，宣传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鼓吹反帝反封建革命，是20世纪初期云南广大胸怀赤子之情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革命最重要且取得成效最大最明显的活动内容。

二、五四运动前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促进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

民国初年，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发动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在深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封建思想禁锢之苦的云南各族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激起了他们追求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情。留学海外或游学国内的云南各民族知识青年不同程度地接受着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和洗礼，他们用自己的笔，在其创办、主编或参与编撰的报纸杂志上，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大力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军阀专制统治，呼吁云南各族人民投身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之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云南地处边疆，但革命的曙光不可抗拒地照亮了云岭大地。云南的不少进步报刊开始增加篇幅，介绍、研究、讨论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以及苏俄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传播马列主义云南第一人”龚自知（云南大关翠华人），于1919年2月在其主编的《尚志》杂志中转载了李大钊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较系统地向云南乃至全国人民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并以《一九一九年》为题发表社论。^[4]“云南革命三杰”之一“爱国弃家”的马骧，于1919年5月在其以私人名义创办的《滇声》报先后登载了列宁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传记，次年3月又分两次以《马克思逸话》为题连载了读马克思传的读后感，该文称马克思是“19世纪后半叶的大思想家大革命主义者”。^{[5] (P58)}这些进步刊物对马列主义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介绍，使云南的进步青年及广大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思潮在云南迅速扩散并更为高涨，在青年中几乎形成了“以不知民主和科学为耻”^{[6] (P407)}的风气。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潮，进一步激发了云南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对英法列强野蛮侵略的激愤、对封建军阀主义独裁统治的不满。这时，宣传爱国民主思想的省内报刊也逐渐增多。云南救国团张天放（云南腾冲人）创办的“云南第一家使用白话文”的刊物《救国日刊》、云南学生爱国会会长杨兰春（杨青田）主办的倡导文体改革的《学生爱国会周刊》等进步期刊，纷纷

刊载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报道和评论的文章，在云南各界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 (P395-397)} 1919 年下半年，昆明开始出现“新亚书店”和“日知社”^{[3] (P84)} 两家专售新思想报刊书籍的书店，《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从各种渠道流入云南，使社会主义思潮在云南各界中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在五四运动民主思想的陶冶下，云南学联中接受了先进思想、志同道合的学生，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初步地提出了要求改造社会的宗旨，并决定用云南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名义创办月刊《滇潮》，作为团体的舆论宣传阵地，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影响。1920 年 10 月，《滇潮》在创刊号发刊辞中写道：自五四运动以来，各省学界在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行动起来，云南则因地理因素，处于“睡眠状态”，是落伍者。因此应尽快觉醒，“去寻找一条跟上时代的路径”，热望“打破内外资本强权的恶势力，贯彻国民生活的民主化，树立新社会制度新经济组织”。^① 由滇籍留日学生编辑、在上海印刷发行的《曙滇》等杂志，较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1925 年秋，云南旅外进步青年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名“新滇社”）在北京成立，并创办了社刊《革新》（后改名《铁花》），以“团结云南革命青年，砥砺训练，钻入社会的中心，作根本的、实际的改造”为宗旨，旗帜鲜明地提出“用革命的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压迫民众的恶势力，实现国民革命与真正的民主政治”。^{[6] (P524)} 在省内，省立一中图书管理员李国柱于 1925 年初发动该校进步学生，秘密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并在开智印刷公司建立了工人小组，秘密印刷革命书刊，同时开办了专门订购和发行革命书籍的云南书报合作社，还创办了《云南学生》^{[6] (P519)} 杂志。以新滇社和云南青年努力会为首的进步团体开展的革命出版活动，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疾呼“我们为要由这种奴隶的苦境里解脱出来，向光明的新社会，得到人间的真的生活”，^[7] 进一步促进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筹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早期领导下的出版活动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各族人民的心中，不断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5 年 9 月，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1926 年 11 月 7 日，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在昆明节孝巷 55 号正式成立。这一云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光辉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云南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的伟大时代。在共产党先进革命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云南革命出版工作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的历史重任，广泛动员并武装了革命分子的头脑，推动了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及其领导、影响下的革命群众团体，通过出版发行或编印党刊、内部读物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书刊，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云岭大地各族人民心中。1929 年 9 月 14 日，云南省委（省临委）向中央“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使党的宣传工作与群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提高党内及群众的政治水平线，增强无产阶级的意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连（联）系起来，使群众种命斗争中，增强了斗争的武器”。在“党内宣传教育工作之一般”中明确要求：“出版《党内生活》，目的是提高同志的政治和发展下级同志对工作的建议、讨论和批评。又出版《临委通讯》，可将国际、中央、省委的指导传达于各支部”，“编辑关于理论方面的小册子”，“出版党的机关报——《斗争》，分析目前的政治问题及反（国民党），反改良主义等”，“设立图书馆，汇集关于理论的各种刊物书籍，以供做口口^②讨论参考”。在“关于群众方面的经常宣传工作”中要求：“出版《工农兵》政治小报。内容是用浅近文字分析政治，介绍国际国内及本省内工农斗争的消息，及战争的消息”，“出版《云南工人》，内容是描写云南工人的消息，并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编辑关于工农兵的小册子，如《农民四字经》《八点钟》《走厂调》《月叹穷》《兵士歌》《马家坝演义》《士兵之路》。同时用普通歌谱来编歌……”^{[6] (P333-335)} 在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思想的指导下，影响力较大的革命刊物主要有：中共云南省临委的党刊《斗争》（半月刊）以及《工农兵》（三日刊）、《云南工人》（周刊），昆明总工会的《斧头》、云南妇女解放协

¹ ① 原载 1920 年 10 月 25 日《滇潮》创刊号，系发刊辞《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本月刊》

②原文缺字。

会的《女声》杂志等；党内刊物还有《临委通讯》《临委通告》《党内生活》等。同时还编印了面向滇省各族人民及工农兵宣传的普通读物《八点钟》《五卅宣传大纲》《反对帝国主义二次大战》《中共宣言》《中国劳苦群众到哪里去》等，^{[6] (P336-337)}为配合革命政治斗争，还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和传单。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及革命群众团体还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或半公开销售《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3] (P16)}以及《政治生活》《政治周报》《现代社会学》等革命理论书刊。地下党员卫秉礼、熊文和等在墨江以开办的文劲书店为掩护，秘密销售《唯物辩证法》《工农红军读本》等革命书籍。地下党组织在风险重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翻印发行了《列宁主义概论》《无产阶级之战术及战略》等进步书刊，使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祖国西南边睡的山乡村寨。

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方，早期革命活动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不可避免地要和本地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时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的王德三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他结合云南边地实际，专门组织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少数民族问题大纲》，^{[6] (P183-184)}提出党“应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提出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等观点。1929年前后，王德三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编写了《苗夷三字经》（又称《夷经》）^{① 2}，宣传了少数民族受剥削压迫的原因，鼓励他们“齐心联合挣天下”“土地革命世界新”。^{[6] (P352-370)}1928年夏秋之际，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赵柞传将马列主义同农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朗朗上口、语言生动的顺口溜形式编写了《农民四字经》^{[3] (P86)}控诉了反动阶级“嘴讲博爱，吃人脑袋”的丑恶罪行，呼吁劳苦大众“大家觉悟，认清仇敌，团结一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毫不客气，代表选出，组织政府，地主田地，分来种植”。此外，党组织的其他领导人李鑫用矿工喜闻乐见的曲调，填上揭露剥削压迫、诉说人民苦难的词，编写了20多首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革命歌谣。《苗夷三字经》《农民四字经》的刊印发行及通俗易懂的歌曲等宣传品的广为流传，较好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开辟了道路，并推动了云南革命形势的持续发展。

1930年底，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残酷镇压，王德三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壮烈牺牲，云南革命出版工作受到空前扼制和窒息。但是，散布在云南各族人民手中的革命出版物却成了不灭的思想火种，在群众中辗转传阅，继续照耀着革命的道路，为迎接云南革命的下一轮高潮积蓄着力重。

四、积极倡导并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时革命出版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拉开了华夏儿女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序幕，中华民族在这一天彻底觉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暴行，也激发了西南边睡各族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被血腥镇压破坏长达5年之久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恢复重建后，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秘密出版发行了各种进步书刊。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创办了秘密刊物《火山》，^{[3] (P87)}刊登《八一宣言》等党的前沿文章，呼吁停止内战，宣传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并指导云南各族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临工委建立抗日救亡秘密团体“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创办了秘密刊物《救亡》，号召云南各阶层人民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同时，云南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省区之一。1935年和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经过云南，并从石鼓等地胜利渡过金沙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②。红军长征过云南沿途，留下了诸如《怎样分析阶级》《中国工农红军》《支部工作纲要》《红军战士读本》^{[3] (P87)}等从苏区带来的许多革命出版物；驻扎或经过村寨时，写下了大量革命标语和宣传漫画，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使共产党的主张得以广泛传播，直接促进了云南最底层被压迫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

² ①此处的“苗夷”泛指云南边地苗、彝、哈尼、壮、瑶等各少数民族。

②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长征。

1937 年的“七七”事变，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8] (P3)} 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为我国抗战的大后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随后，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中法大学等高校，中央研究院等文化团体也先后迁至昆明，一大批专家、教授、名流学者、文艺青年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也随之纷纷荟萃昆明，使昆明成为当时和重庆、桂林三足鼎立的文化中心；^{[9] (P1)} 滇省内外的爱国民主力量也由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爱国民主力量，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和“进步文化活动中心”。^{[10] (P20)} 在抗日救亡活动的推动下，在党的领导、组织和影响下，各种进步社团不断涌现，云南逐步形成“爱国、民主、进步”为主流的文化氛围，书刊出版业也非常活跃，革命出版发行工作也呈现了空前的发展高潮，使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得以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适应抗战新形势的发展，1937 年 10 月，中共云南临时工委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用非党名义公开登记出版了党刊《南方》。^{[3] (P87)} 《南方》及时刊载抗战时事论文，阐述抗战救国政策和救亡理论，批判在抗战问题上的各种歪理邪说，介绍抗日救亡工作经验及方法，引导云南各族青年走向革命进步的道路。《南方》的出版行使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被誉为“云南救亡工作的指针”和“地方文化的开拓者”。《南方》第一期印刷 500 份不够销售，后逐期增加印数，最高时每期发行 3500 余份，发行到全省 50 多个县和全国有生活书店的省份。《南方》刊载的抗战时情文论主要有《云南学运的组织问题——献给学抗会》《蓬勃开展的反日游击战争》《目前新的情势》《云南学生运动的检讨》《云南青年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坚守抗战与妇女解放运动》《从国家两大阵线的对立说到我们应有的努力》《在全民抗战旗帜下》《保卫云南》等文章，呼吁全民抗战；揭露和批判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失败主义的文章主要有《驳斥失败主义者》《严防汉奸和投降分子的活动》《肃清动摇妥协分子》《严防肃清托派汉奸》《对汪精卫通敌卖国应有的认识》等，对抗战问题上的各种歪理邪说及时给予无情的揭发和批判；刊登了《军长到阵地上去了》《田舍英雄》等大量来自前线的战地通讯，以及《国仇不报誓不回乡——献歌抗日战士》《用炸弹回答敌人的炮响》《逸西的农村》等文艺作品，发出了“民族解放的喜音在响，中国的胜利就在前方，中国的革命已经在望”^[11]的希望，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信心。与此同时，中共昆明支部成立后，于 1937 年 9 月创办了革命期刊《前哨》^{[3] (P87)}，以刊载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指导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为主的时论文章（出版 2 期后因登记问题被迫停刊）。1941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皖南事变爆发后，迫于复杂的形势压力，公开刊物《南方》因人员疏散停刊。革命出版活动再次被迫转入地下。

处于反动专制中的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为了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解放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以大无畏的精神，于 1943 年 8 月开始，在昆明秘密出版了党刊《战斗月报》^{[3] (P87)}（先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战斗月报》先后刊载（或转载）的重要文章有《质问国民党》《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对比》《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党中央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或演说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学习与时局》、《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此外还刊载了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的文章，报道了云南各界革命运动的情况。《战斗月报》刊载的文章理论前沿，观点正确，所以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闻一多、吴晗等众多爱国民主人士都如饥似渴每期必读。

1941 年 2 月，由于受皖南事变影响，党领导的为出版发行党刊和革命理论著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云南的分店被国民党当局通令查封。^{[3] (P19)}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三家分店以昆明为中心，公开或秘密发行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革命启蒙读物，同时还发行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导人的著作或言论集，以及中共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大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文艺作品。虽然皖南事变后云南的革命刊物和出版机构被大量查封，但革命出版的火种并没有因为白色恐怖而熄灭。云南地方党组织或党员在昆明开办的进修出版教育社（1942 年 9 月开业）^{[3] (P93)}、康宁书店（1944 年 8 月开业）^{[3] (P91)}、高原书店（1943 年 7 月开业）^{[3] (P90)}、《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分处（1945 年 5 月开业）^{[3] (P91)}、群意书店、新民书店、华侨书店，以及在党的支持帮助下由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创办的北门书屋（1942 年 12 月开业）和北门出版社（1943 年创办）^{[3] (P94-95)}，还有分布在全省各地由中共地下组织或党员及与党关系密切的进步人士开办的许多书店，克服了反动专制统治下的重重困难，将党报党刊和大量的革命理论著作、革命文学作品在云岭大地广泛传播，为

处于当时秘密隐蔽、积蓄力量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分子提供了精神给养和思想武器，并引导了大批进步的各族青年认清形势，接受革命思想，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此外，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革命出版活动还渗透到国民党当局的机关媒体。1935 年 5 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创刊，云南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先后派了一批党员潜伏进该报社，在报社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并努力团结报社中的进步人士，不断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所以，抗战期间的《云南日报》有相当的篇幅宣传坚持抗战的思想，尤其是国际版和副刊《南风》，还相继刊载过《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谈抗战前途》《论新阶段》，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和言论，在云南产生深远影响。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皖南事变前，在党组织和党员的团结和影响下，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民主人士，也纷纷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各种合法的名义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战时知识》《文化岗位》《战歌》《民众呼声》《新文字》等进步刊物。皖南事变后，不少进步刊物被迫停刊。直到 1944 年，随着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党组织领导或创办的《高原》《建民小报》等进步刊物又开始秘密或公开出版。1944 年 12 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创办《民主周刊》，积极主动地宣传团结抗日和民主进步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云南革命出版发行活动始终以宣传抗日救国、民主进步为宗旨，积极呼吁和平与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唤醒并激励民众，动员和组织各阶层人民一致对外抵御外辱，多渠道、多形式发展并巩固了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五、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云南和平解放营造了正确的舆论引导

1945 年 8 月 15 日，经过华夏儿女万众一心、艰苦卓绝历时八年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面对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巨大伤痛，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和安定，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新中国。但国民党反动政府置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于不顾，一意孤行，并于 1946 年 6 月悍然撕毁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一切协议，挑起全面内战。内战爆发后，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根据革命形式的发展和要求，使出版发行活动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广泛动员组织三迤大地各族人民踊跃参加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革命出版活动多渠道、多层次宣传民主与和平的思想，控诉国民党反对政府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1945 年 12 月 1 日，由昆明青年学生发起并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一二·一”运动爆发，标志着国统区“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正式拉开序幕。革命出版活动也同步开展，正面宣传学生爱国运动并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各学校的学生党员为骨干，秘密编辑出版了“一二·一”运动罢课联合委员会的会刊《罢委会通讯》，并在 27 天内先后刊印了 15 期和 2 期增刊（每期印数都达到上万份）；同时还印发了《一二·一惨案实录》（印数达 50 多万份）、《昆明学生为“一二·一”事件告各界同胞书》、《昆明大中學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以及告农村父老书、告家长书、告师长书等等（1945 年 12 月 27 日学生复课后《罢委会通讯》终刊。）^{[3] (P88)} 1946 年 1 月 11 日，《学联简报》（后改为《学生报》）出版发行（共出版 28 期）。《罢委会通讯》和《学生报》以及云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同时进行的其他革命出版活动，积极促进了“一二·一”运动的胜利，并为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6 年夏，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党内和外围组织中秘密刊发《新华通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唤醒民众觉醒。与此同时，昆明的进步报刊《民主周刊》《妇女旬刊》《时代评论》《独立周报》《大众报》《昆明新报》《匕首》等，也始终站在正义的立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发挥了革命运动的喉舌作用。

云南地方党组织在内战时期还通过党的秘密印刷厂以及一些进步书店，大量印制并销售《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革命理论著作，^{[3] (P87-88)} 并配合各阶段的革命斗争形势，大量翻印党中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对滇黔川康国民党军政

人员公告》等公开文告，并秘密投送给昆明国民党党政及军警中上层人员。这种半公开的特殊的发行工作对国民党当局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起了重要的作用。1948年，中共云南省工委成立了新闻界党小组，直接联系潜伏在《正义报》《民意日报》等报社中的地下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团结争取了各报社的许多先进的编辑、记者，并通过《正义报》《观察报》《平民日报》等报纸不断公开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定和谈代表的声明》《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往何处去？》，以及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令》《约法八章》《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中共的文告和新华社的重要消息报道。各报社并发表了不少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独裁统治云南的社论，廓清真相，以正视听。

1947年2月1日、3月8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和《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敌后各地党组织依靠群众勇敢谨慎地领导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云南各地人民武装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创办报刊开展出版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宣传报道全国解放战争和云南革命斗争的形势。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各地委、工委以及革命武装组织编辑出版了如《战斗报》《盘江报》《滇西北日报》《滇西人民报》《消息报》《红旗报》《挺进报》《解放报》《胜利报》《进攻》《学习与生活》等进步刊物。当时的革命出版工作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编印了许多宣传革命知识的普及读物，如《战士政治教材》《民众识字班读本》《新时代文丛》，还印发了《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李先念的《中原突围记》、王震的《南征记》，以及《论党》《反对自由主义》《解放歌声》《地方干部手册》《农民干部手册》《军事干部手册》《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战士识字课本》等大量的革命理论著作和通俗读物。^{[3] (P87-88)} 这些出版物，对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以及宣传党的政策，普及民主与解放的革命思想，提高边地各族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水平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的革命出版活动，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革命热情，组织和动员各族人民参加争取民主与解放的伟大斗争，大造革命舆论，影响并争取中间势力认清革命道理，接受革命思想，并在1949年“九九整肃”前，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整个云南争取和平解放的势不可挡的革命声势，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直接推动了以卢汉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走向正义、投向人民的光明道路。1949年12月9日，云南宣布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云南政权后，云南出版活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迈上了全新的出版征程。

【参考文献】

- [1] 郑卫东，伍庆玲. 百年云南图书出版与贸易[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 [2] 王薇. 革命同盟 时代尖兵——《云南》[N]. 云南经济日报，2014-9-26.
- [3]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 云南省志卷七十六·出版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4] 王薇，刘金富. 《尚志》——云南早期的社会科学期刊[N]. 云南经济日报，2014-10-24.
- [5] 荆德新.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云南的早期传播[J]. 思想战线，1986，（3）.
- [6]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 [7] 王薇. 《曙滇》——以三寸秃笔，唤起民众之自决意识[N]. 云南经济日报，2014-0-10.
- [8] 杨绍军. 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文学科学学术史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 [9] 蒙树宏.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
- [10] 中国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迁院校在云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 [11] 王薇, 刘金富. 《南方》: 中共云南省工委党刊[N]. 云南经济日报, 2015-8-14 .
- [12] 白兴发.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